论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中的身份问题
摘要：身份研究是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身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些身份比如主体的族裔性、性别等是与生俱来的，无法选择的、单一的；有些身份是后天建构的、多重的，可以选择的。当今的主体置身于多重而差异的世界中，因为不同的关系、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归属等都可能赋予他／她一种潜在的身份。身份问题的研究既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自我认知的角度，更是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中极其重要的方法和路径。
关键词：少数族裔文学；身份问题；多重性众所周知，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黑人文学的繁荣和兴旺，也就是所谓的“第二次美国黑人文艺复兴”，使美国文学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些著名的文学协会开始关注少数族裔文学，如“美国研究协会”多次召开会议专题讨论美国文化多元化与少数族裔文学。1972年还成立了“美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从1978年起举办年会、出版期刊，积极地向研究者推介少数族裔作家及作品。20世纪90年代初《批评探索》这一跨学科的学术理论刊物相继发表了“认同的政治”系列论文，后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约请kwame anthony appiah(凯姆·安瑟尼·阿皮亚)和henry louis gates(亨利·路易斯·盖茨)将论文编辑出版，题名就叫《身份认同》(identities)。其中有一个突出的核心观点——身份已经裂变成了多重指向，不再是单一的。
在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中，美国华裔文学和美国黑人文学最为引人瞩目。此外，犹太文学、非裔文学、墨西哥裔文学、印第安文学等在美国文学史上都有值得关注的表现。到世纪之交，少数族裔文学批评已经在美国成为一支重要力量，甚至已进入主流大学课程之列。而在世界文学领域里少数族裔文学的创作实绩也令人惊喜，最为有力的一个证明是新世纪以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及作品多有少数族裔或者“离散”的背景，譬如 200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维·苏·奈保尔、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菲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史上第一位土耳其籍诺贝尔奖得主)、2007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20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等等。

“跨越性是比较文学得以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突出特质”，少数族裔文学具有鲜明而突出的跨越性，在全球化多元文化语境的今天，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关注少数族裔文学就有着学理上的合法性和实践上的必要性。
虽然在中国，2003年11月在成都举行了由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主办、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 “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专题研讨会，此后，国内少数族裔文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少数族裔文学创作和国外研究前沿相比，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
在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中我们可以从身份或身份认同这一视角切入，来认识作者、解读文本，以便使文本中遮蔽已久的历史、扭曲的种族经历、各种离散身份和边缘身份、喑哑的少数声音等等揭开遮蔽的面纱，使之去蔽，回归本真。
开始于20世纪中期的民权运动促进了西方世界中边缘性别和少数族裔的觉醒，继而开始了大规模的身份认同运动，也从此开始了从社会层面到知识话语领域对身份的探讨和认识。而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反本质诉求则又进一步推动了身份研究。“身份”是英文identity的汉语翻译。其实，英文 identity在我们汉语语境中有多种译法，最主要的有“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同一”、 “同一性”等等。我们认为，“身份”更侧重的是差异性，“认同”则更突出的是同一性。身份／身份认同研究已经超越了学科界限，“身份”(identity)一词已经成为当今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的关键词之一。它在少数族裔文学研究和批评中更是成了一个新近的高频词、重要的关键词。英国伦敦大学文化研究学者保罗· 吉尔特(paul giltoy)就明确指出：“作为一个概念，‘身份’已被置于一系列急迫的理论论争和政治问题的核心地位。”随着人们对身份探讨的深入，我们看到身份与文化、身份与宗教、身份与种族、身份与性别、身份与语言等成为了近些年学界少数族裔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主要对象。
但是，近些年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中对身份的关注最重要、最突出的则是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其实，身份
或身份认同是丰富多样和极其复杂的，所以，我们才认为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中的身份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厘清和探讨。

身份或身份认同并不是天生不可更改的。身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有的身份是自然天成的、比较单一的，有的身份则是后天建构的，且具有可选择性。
首先，任何主体的族裔性、性别是无法选择的、与生俱来的、单一性的。任何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从他／她降生之日起，其性别就是明确确定了的，要么是男性，要么是女性，性别是单一的，而且也是无法选择的。同样，他／她的族裔性也因为其父母的族裔性而先在地决定了，他／她作为生命个体是无法选择父母的，与此相应的是其族裔性因父母的族裔性而无法选择。此外，每一个主体还有很多身份却是后天人为建构的，主体身份往往是多重的，而且有些身份是可以选择的。
身份或身份认同是主体在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之关系中对自己的关系归属、本质特征和生命意义的确认、赞同和接受。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指出：“建立在对人的这样一种理解基础之上，即人是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统一个体，他被赋予理性、意识和行动能力，其中心由一个内在核心构成……自我的根本中心是人的身份认同。”斯图亚特·霍尔指出了人之成为一个统一体，其根本核心就在于自我的身份认同。被称为20世纪法国沦陷“黑暗时期的三女哲”之一的西蒙娜·薇依则说，“扎根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忽视的一项需求。这是最难定义的事物之一。一个人通过真实、活跃且自然地参与某一集体的生存而拥有一个根，这集体活生生保守着一些过去的宝藏和对未来的预感……每个人都需要拥有多重的根”。西蒙娜·薇依所说的“扎根”、“根”，其实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主体在与他人、与集体的关系中所寻找和确立的归属和身份确认。
但是，置身于大干世界的主体的身份也具有多重性和多样性，因此可以说身份是一个复合体。在丰富多样、变化不居的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实际拥有着多重身份，除了性别身份、族裔身份、公民身份外，还有诸如籍贯、出生地、居住地、宗教信仰、经济、文化、阶级、教育、职业、语言、科学、道德、政治立场等等。我们有太多可以同时归属的类别，每个人同时属于许多个群体，其中任何一个群体和一种归属都会赋予他／她一种具体的身份。对此，斯图亚特·霍尔就曾经精辟地指出：“身份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透明或毫无问题。也许，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做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做一种‘生产’，

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
在外部构成的再现。”斯图亚特·霍尔在此明确地论述了主体身份的复杂性、生产性、建构性。例如，我们熟知的罗庆春在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网站上是如此介绍的：“罗庆春，彝族，四川冕宁县人，彝名阿库乌雾，彝学学院院长，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点领衔导师，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成都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理事长，四川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客座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罗庆春先后于2005年、 2008年、2009年应邀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俄勒冈州立大学等十余所大学访问讲学，多次应邀参加国内外诗会并朗诵母语诗歌。先后出版彝、汉双语诗集：《冬天的河流》(彝文，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母语现代诗集)、走出巫界》、 虎》 (彝文，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母语现代散文诗集)、《tigertraces》(彝英对照，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彝英对照版诗集)、《阿库乌雾诗歌选》、 密西比河的倾诉》、 神的祝咒——阿库乌雾人类学散文集》《、血混代》 。等在这”段简洁的介绍性文字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罗庆春身份的多重性、建构性——从族裔的视角，他的身份是彝族人；从性别的视角，他的身份是男性；从籍贯的视角，他的身份是中国四川冕宁县人；从行政职务的视角，他的身份是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院长；从职称的视角，他的身份是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点领衔导师；从社会兼职的视角，他的身份是成都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四川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从学术兼职的视角，他的身份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理事长、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客座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兼职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导师。此外，他还是著名的彝汉双语诗人，等等。其身份的多重性、复杂性、建构性、选择性，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而且，我们有理由推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自身的努力、社会的发展，几年后罗庆春的介绍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变化，也就是说他的身份会表现出变化发展性、人为建构性。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主体身份往往确实是多重的、变化的、建构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个体都

有多种社会关系，都是多种不同群体的成员，都具有多重归属，而每一种归属、每一种关系和每一个群体都会给他／她提供一种潜在的身份。对此，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中指出：”文化身份是‘变成的’，它既属于未来，也属于过去。它不是一个既定的事物，而是渗透着区域性、时间性以及历史与文化。不同的文化身份是一定的历史背景所形成的。但它们与所有具有历史性的东西一样，总是经历着一定的发展变化。它们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本质化的过去之中，总是由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作用而不断的变化。它们不是依靠过去的发现，或等待被发现，以及一旦被发现，就会保证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处于一种永恒状态。身份是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被给定的，它们涉及到我们被设置的地位和在过去的叙述中所确定的地位。”虽然，斯图亚特·霍尔在此论述的主要是文化身份的不确定性、建构性，但我们可从中看出又岂止文化身份是如此，主体的多重身份何尝不是后天建构的、变化发展的。对此爱德华·w·萨义德也认为“人类身份不是自然形成的，稳定不变的，而是人为建构的，有时甚至是凭空生造的”。萨义德也明确地指出了主体身份是变化发展、人为建构的。而福柯则认为，“人的本质——假如人有本质的话——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固定的、普遍的东西，而是由许多带有历史偶然性的规范和准则塑造而成的。而那些规范和准则，又是由每个人都必须在其中成长的风俗、习惯和制度所规定的”。福柯所谓的“人的本质”包括主体自我身份，他指出了身份认同并不是天然给定的，而是因偶然性塑造的，换言之是可以后天人为建构的。
在不同的语境中，每种关系、每种群体、每种归属，都可能会赋予他／她一种特定的身份，使他／她获得某种归属感，拥有生存的“根”。霍尔还说：“主体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再也不以统一自我为中心了。我们包涵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指向四面八方，因此我们的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所以，任何一种绝对的、本真的、纯粹的、固定的身份认同和身份诉求，在今天都是难以成为现实的。在公民身份下，我们既应该允许每一个人有多种归属、多种关系、多种身份的选择，也应该承认他人各种身份的多重性、多样性。
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已经使得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变得空前剧烈与频繁，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与杂

交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的基本‘特色’”。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移民变得较为容易和普遍，也就出现了自愿“离散”，身份认同焦虑和身份建构问题必将困惑着越来越多的人。譬如某一个人从乡村迁往城市，或者从原居住国移民到另一个国家，他／她就成为了“游牧”主体或“离散”主体，他／她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地理气候、居住环境、工作职业、食物用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经济收入、政治文化等实际问题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很快会出现诸如“我曾经是谁”、“我现在又是谁”、“我为何要如此生活”、“我这般生活的意义何在”之类的问题，此时的他／她就迫切需要使自我与变化了的环境重建某种有效的联系，以便他／她利用这种联系以确定自己的身份，从而找寻自我的落脚点和人生的意义。因为“身份的认同感不仅给人骄傲与欢愉，而且也是力量与信心的源泉”。故此，离散写作、身份问题不仅在少数族裔文学中会越来越受关注，而且在整个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也会越来越普遍。
任何人都不是在绝对孤立、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生活的。因此，即使是具有不同身份的主体之间也必然有着广泛联系的。不同身份之间，有时又是相互影响的，甚至有些身份之间还可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因此，我们不仅要认识到身份的建构性、多重性、变异性、复杂性，同时要警惕身份认识上的简单化、单一性，并尊重主体身份的选择性。
对于任何人来说，理解并认识到本质身份、单一身份是不存在的。但过去很长时间，我们都习惯于对世界人口从宗教或文化来进行单一分类，“对世界人口的这种宗教或文化分类导致了一种人类身份的‘单一主义’(solitarist)认识，这种认识将人们视为仅仅属于某一单个群体(或是像现在这样根据宗教或文化区分不同人群，或是像以往那样按照民族和阶级来加以区分)。单一主义的认识往往容易导致对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人的误解”。本质主义、单一主义的身份观或身份认同观，容易忽略、无视甚至剥夺主体身份的多样性、丰富性、变动性，而表现出绝对化、单一化、简单化的不足。
如果将某一个人的某一关系、某一归属、某一群体比如族裔或宗教或文化看成是包罗万象的唯一身份，这显而易见是错误的。一个人的某一种身份，并不能完全解释或解决他／她在现实生活中所作出的所有决定和所有行动。一个人的某一身份，并不能抹杀他／她的其他所属关系和群体身份。否定身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都

存在着明显的偏狭。如果大家一味强调某一个体的单一身份或唯一身份，这种简化主义、单一性粗糙分类、单维度身份认同和身份确认，既忽略了现实生活中的人所具有的多重关系，也忽视了人在现实生活中分别归属的许多不同团体，无疑会产生放大效应，从小的角度讲不利于主体身份认同、归属感找寻、个体自我确认等，从大的方面来说则容易造成冲突和对立，不利于社会和谐、人类和平。而且，坚持身份毫无选择的单一性认识，会导致对人的过分简化，削减全人类共享的人性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当代，实现世界和谐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人类身份多重性的更为清晰的把握，以及充分认识到，人们的这种多重身份是纷繁复杂的，并且坚决反对将人们按照某一单一的、鲜明的界限来进行划分。”
在现实生活中，某一种身份的重要与否有时并不一定很清晰很明确，相反往往是存在着诸多困惑的。认识到个体身份的建构性、多重性固然重要，但面对多种身份在具体的语境中如何选择则更加重要。“只要承认我们身份的多重性以及它们具有不同的含义，那么就需要我们在无法避免的不同身份间根据其各自的切合性和相关性进行选择，这一点特别重要。”虽然我们不可避免地拥有多重身份，但在每一种情况下、在某一具体语境下，我们必须确定，各种不同的身份对于我们的相对重要性。
身份在有些时候似乎是不太重要的，但是在有些时侯、某些具体境况下可能变得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每一主体在具体境遇下必然面临身份的选择问题。因为，在具体的、不同的社会关系、集团群体和归属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决定何者更为优先或何者稍微次之，有时是经过认真思考后清晰明确的抉择，有时也许就是无意识或下意识的决定，但选择是肯定存在的，也是应该的。
当主体在具体境遇中必须做某件事时，其对自身各种身份必定有个选择的问题，是公民身份、政治立场优先，还是宗教信仰、族裔身份更重要，这时他／她对自己各种身份的忠诚度之间就有可能出现犹豫甚至发生冲突了。但是，虽然此时出现犹豫、有冲突甚或出现对立，但没有必要要求某人抛弃所有其他的身份而只能拥有某一种唯一的身份。身份认同的双重忠诚或几重忠诚是有可能存在的。我们没有必要在肯定某一种身份的优先性时一定要否定另一种身份的存在。合理选择甚至相互竞争的身份是完全可能的。当然，选择身份的可能性，

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自身特点和外部环境，选择是在具体的限制条件下甚至是特定约束下作出的。
关于身份所形成的认知范式、思维观念、价值判断、审美期待等正日益深刻而又明显地影响着文学创作、文学接受、文学批评等，这种影响在少数族裔文学创作和研究中更是十分突出而明显。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由56个兄弟民族组成的和谐团结进步的大家庭，中华文学是由汉文学和少数民
族文学共同构成的，中国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文学多样性是丰富的，丰富多彩的中华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文学大厦不可分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从新中国成立至1999年，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持续不断地提供资助，出版发表了3000多部与此相关的作品，这当中有些作品已经进入了高等学校文学课程。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国中，汉民族文学和少数族裔文学和谐关系的形成，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构建，必将进一步对中华文明作出新的诠释。
身份研究在西方日益繁荣并呈现了跨学科趋势。在西方文化研究引入我国学界、文化诗学蔚然成风的今天，身份问题和身份意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自我认识方式，于是我们看到近些年在中国学术话语层面上“身份”在社会学、哲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文艺学等不同学科被研究者主题化，出现了关于“诗歌身份”、“文学身份”、“美学身份”、“民族身份”、“中国身份”等诸多研究命题。身份问题的研究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自我认知的角度，同时身份研究之于文学研究会促进一些个案研究和理论思考，而身份研究之于少数族裔文学研究则是极其重要的研究方法和路径。我们可以通过身份或身份认同这一视域来解读少数族裔文学文本并认识作者，进而深化少数族裔文学研究。